

doi:10.3969/j.issn.1001-4616.2016.01.018

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王 坤^{1,2}, 黄震方¹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上海、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相对较高,苏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相对较低。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4种类型。培育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多元驱动机制是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

[关键词] 旅游经济, 城镇化, 耦合协调发展, 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16(2016)01-0101-07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n Coordinat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Kun^{1,2}, Huang Zhenfang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model of coordinative and harmonious degre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regional urban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whole has been in the moderate coupling stage. Shanghai, Hangzhou, Nanjing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cities in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of Jiangsu provinc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low. Combined with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reg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nclude harmony area, running-in area, antagonism area and low coupling area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The paper thinks that breeding the Multiple driving mechanism, including policy guarantee and policy regulation mechanism,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running mechanism, tourism service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mechanism,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justice mechanism,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ic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tourism economy, urbanizati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Delta

收稿日期: 2014-08-07.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SJB39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01148, 412711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4YJC790003)、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15_0219)。

通讯联系人: 黄震方,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huangzhenfang@njnu.edu.cn

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中央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举措。作为关联带动性较强的服务性行业,旅游业是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的发展也为旅游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和保障。因而,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耦合关系,其耦合作用强度的测评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构建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当前,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旅游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旅游经济是城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旅游城镇尤其如此。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典型发展模式较早受到关注^[1]。国内外学者在明晰旅游城市化的概念框架基础上,以典型的旅游城市为研究案例,深入探讨了旅游城市化的特征、模式和机制^[1-6];其二,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余凤龙等探讨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7],杨亚丽等从时空二维视角分析了城市化对国内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8],王兆峰等定量分析了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强度,并专门从交通条件改善角度解读了作用强度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9];其三,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早期学者多从定性角度分析了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同构互动关系^[10-11],之后计量经济模型和耦合评价模型等定量方法的运用逐渐增多,赵磊和钟嘉雨等采用计量模型均得出了旅游业与城镇化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12-13],但徐洁等认为二者不存在显著的互为因果的关系^[14],高楠等也通过构建西安市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模型对两系统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15]。

综上所述,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从空间视角来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较少。长三角地区作为旅游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旅游经济优势、实现城镇化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这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的积极稳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尝试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ArcGIS 软件来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期能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持续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耦合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16]。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客观上存在交互耦合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旅游经济发展能够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首先,旅游业是综合性较强的产业,旅游经济发展促进了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进而推动了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实力,加快了经济城镇化的推进;其次,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带动性。旅游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提升了人口城镇化质量;再次,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城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了城镇与外界的物质流、信息流及人员流动,使城镇地域范围和辐射强度扩大,从而加速了空间城镇化进程;最后,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要求城镇建设配套的服务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这有利于社会城镇化的推进。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也为旅游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加快了旅游设施建设,也为旅游活动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从业者,这都有利于推动旅游经济增长。

综合考虑上述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内涵及前人研究成果^[15,17-18],遵循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将旅游经济分解为旅游经济效益、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发展效率3个维度及相应的9个指标,与已有的仅从旅游收入角度来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该体系较全面地涵盖了旅游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社会的贡献,从旅游经济绩效角度来考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进程的耦合作用;城镇化是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四维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人是核心,经济是动力,空间是载体,社会是保障。因此,将城镇化系统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个维度及相应的12个指标(表1)。

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2年-2013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及2002年-2012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表1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城镇化 A	人口城镇化 A1	城市人口密度 A11;城镇人口比重 A12;人口自然增长率 A13
	经济城镇化 A2	城市经济密度 A21;人均 GDP A22;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A23
	空间城镇化 A3	土地城镇化率 A31;人均绿地面积 A32;人均道路面积 A33
	社会城镇化 A4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A41;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A42;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A43
旅游经济 B	旅游经济效益 B1	入境旅游收入/GDP B11;国内旅游收入/GDP B12;入境旅游收入/出口商品额 B13
	旅游市场规模 B2	入境旅游人次 B21;国内旅游人次 B22;星级饭店数量 B23
	旅游发展效率 B3	入境旅游人次/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B31;国内旅游人次/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B32;旅游总收入/固定资产原值 B33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采用熵值法对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评,主要计算步骤为^[19]:①构建原始数据矩阵 X ,该矩阵由 t 个年份、 m 个城市、 n 项指标构成;②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来消除量纲对测评结果的影响,标准化后的矩阵记为 X' ;③计算各指标信息熵: $e_i = (-1/\ln m) \sum [(x'_{ij}/\sum x'_{ij}) \times \ln(x'_{ij}/\sum x'_{ij})]$,该值可用于判断系统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④计算各指标权重: $w_i = (1 - e_i)/(n - \sum e_i)$;⑤计算各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U_{1,2} = \sum (w_i \times x'_{ij})$.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是相互独立又彼此作用的复合系统,因此可借鉴物理学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学者基于系统间离差最小化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多种耦合协调度模型,其中以廖重斌的测评模型因简便可行而被广泛采用^[20].其耦合度模型公式为: $C = [(U_1 \times U_2) / \Pi(\alpha U_1 + \beta U_2)]^k$.式中, C 为耦合度, k 为调节系数,一般取 $k=2$. 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由于旅游经济发展不是推动城镇化的唯一驱动力,故分别赋值 0.4 和 0.6.耦合度 C 值可判别系统之间耦合作用强度及时序区间, C 值越大,表明系统之间越接近良性共振耦合,复合系统趋向新的有序方向发展.但耦合度仅刻画了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匹配的程度,无法识别其匹配层次.因此,需要进一步运用协调度测评模型^[20]: $R = [C \times (\alpha U_1 + \beta U_2)]^{1/2}$,协调度 R 值更能反映复合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根据耦合度和协调度值可将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类型划分.耦合度可划分为 4 种类型: $0 \leq C \leq 0.3$,表明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为低水平耦合阶段; $0.3 < C \leq 0.5$,则为拮抗阶段; $0.5 < C \leq 0.8$,表明二者处于磨合阶段; $0.8 < C \leq 1$,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度的类型划分与耦合度类似: $0 \leq R \leq 0.3$,表明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为低度协调耦合阶段; $0.3 < R \leq 0.5$,二者为中度协调耦合阶段; $0.5 < R \leq 0.8$,则为高度协调耦合阶段; $0.8 < R \leq 1$,二者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

2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分析

2.1 耦合度空间格局演化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 2001 年和 2012 年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借助 ArcGIS 聚类工具对测度结果进行可视化(图 1).从计算结果来看,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呈现非均衡的空间格局,耦合度值从 0.039 到 0.999 分布不等.两个年份最高的均为上海市,最低的为宿迁市.各城市两年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为 0.732 和 0.769,表明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复合系统整体上还处于磨合阶段,但已非常接近高水平耦合阶段.省域对比来看,浙江城市的耦合度普遍高于江苏城市.

从图 1 中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上看,2001 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主要有上海、苏州、嘉兴、无锡、湖州、杭州、金华、台州和丽水 9 市,2012 年增加了宁波、绍兴、温州和衢州 4 市,而无锡和丽水分别倒退至磨合阶段和拮抗阶段.处于该阶段的城市或者集聚在上海、南京和杭州 3 个核心城市周围,或者分布在核心城市间的交通干线上.这些城市旅游经济和城镇化之间已达到良性共振耦合,复合系统趋向新的有序结构;2001 年处于磨合阶段的城市包括温州、绍兴、宁波、南通、淮安和连云港 6 市.2012 年处于该阶段的浙江城市耦合度提升明显,温州、绍兴和宁波均从磨合阶段跃迁至高水平

耦合阶段,而处于该阶段的江苏城市中,南通和连云港未发生迁移,淮安退至拮抗阶段,无锡从高水平耦合阶段退至磨合阶段,只有徐州和常州从拮抗阶段迁移至磨合阶段;2001年处于拮抗阶段的的城市主要有徐州、盐城、泰州、常州和衢州5市,2012年位于该阶段的主要有淮安、盐城、泰州和丽水4市;两个年份均只有宿迁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可以看出,处于拮抗阶段和低水平耦合阶段的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中地区,该地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说明该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并未完全转化成旅游经济优势,使得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复合系统不断向无序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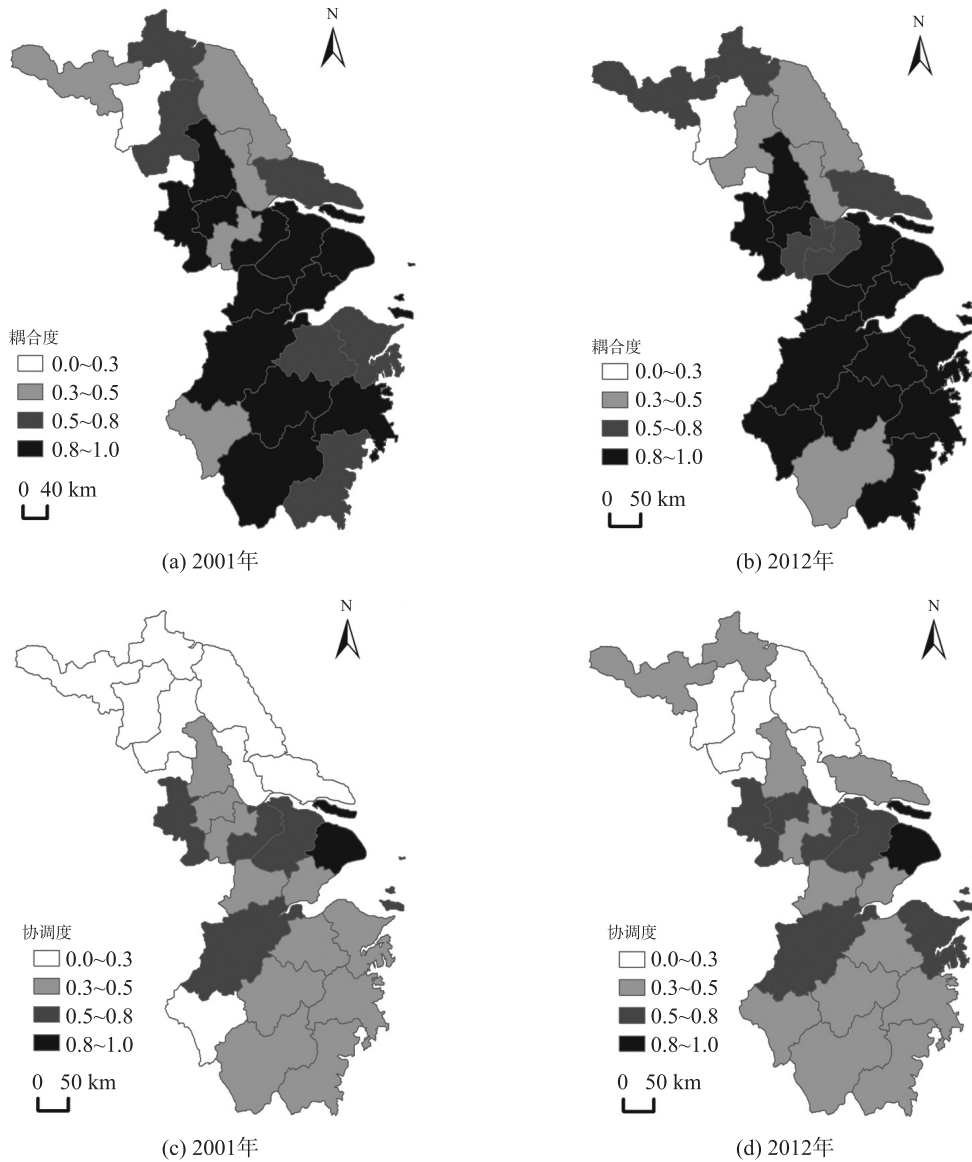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化

Fig.1 Map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2.2 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化

从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度的计算结果来看,2001年和2012年上海的协调度值都最大,分别为0.87和0.86,表明上海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处于极度协调耦合状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01年淮安的协调度值最小(0.17),2012年宿迁的协调度值下降为最低(0.06),表明宿迁的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还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从各年份的协调度均值来看,2001年和2012年分别为0.41和0.45,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均值有所提升,说明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

从图1中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度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上看,2001年和2012年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的的城市只有上海.2001年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的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舟山5市,2012年增加了宁波和舟山.处于极度和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与南京周围,逐

步形成了以南京、上海与杭州为节点的“Z”字形集聚分布格局,这些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水平均相对较高,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较强;2001年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包括扬州、镇江、常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金华和台州9市.这些城市在2012年除镇江和宁波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迁移为高度协调耦合阶段外,其余均未发生变化.同时,徐州、连云港和南通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变为中度协调耦合阶段.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主要分布于浙江及苏中地区;两个年份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空间集聚现象明显,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中地区.这说明该地区两系统之间协同效应较弱.

2.3 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类型

综合长三角各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4种类型区,其空间可视化结果如图2所示.①类型I:和谐区,即高耦合、高协调地区,耦合度在0.8以上,协调度在0.5以上.2001年该类型区主要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和舟山6市,2012年增加了宁波、温州和镇江.可以看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及其交通连线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已经处于旅游经济与城镇化之间高度耦合走向高度协调的阶段;②类型II:磨合区,即高耦合、中协调地区,耦合度在0.8以上,协调度在0.3~0.5之间.2001年该类型区主要包括嘉兴、湖州、金华、台州、丽水、镇江和扬州7市;2012年部分城市发生类型区迁移,绍兴和衢州由拮抗区升为磨合区,镇江由磨合区迁移至和谐区,丽水则由磨合区退至拮抗区.磨合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的外围地区;③类型III:拮抗区,即中耦合、低协调地区,耦合度在0.3~0.8之间,协调度在0.5以下.2001年主要包括连云港、徐州、淮安、盐城、泰州、南通、常州、宁波、绍兴、温州和衢州;2012年宁波和温州由拮抗区跃迁至和谐区,绍兴和衢州由拮抗区升为磨合区,丽水由磨合区退至拮抗区.该类型区主要集聚在苏北和苏中地区;④类型IV:低耦合区,即低耦合、低协调地区,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在0.3以下.两个年份均只有宿迁属于该类型区,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相互作用较小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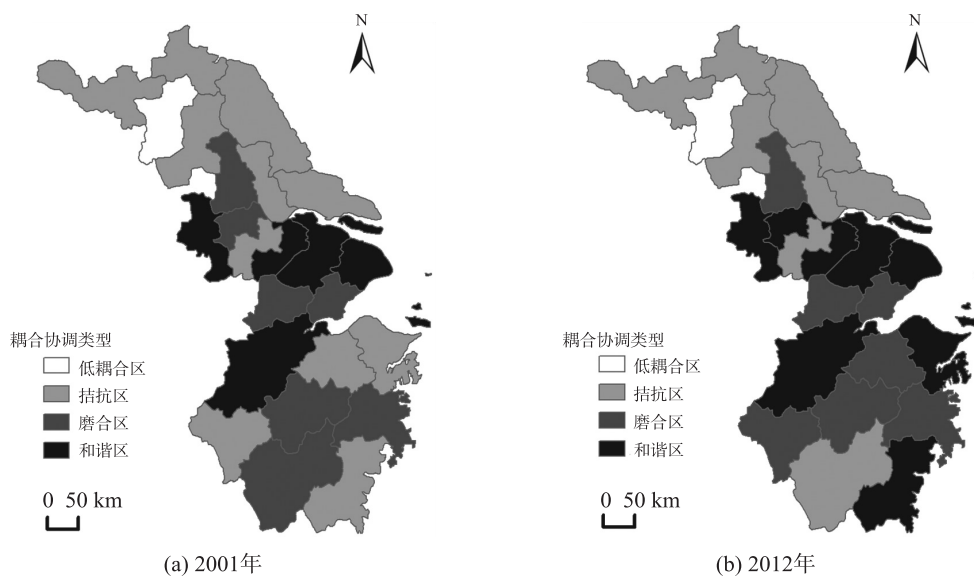


图2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分区

Fig.2 Types of coupling & coordinating area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3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3.1 驱动因素分析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系统内部多种因素共同驱动所形成的结果.由于熵值法所测算的指标权重值大小表示该指标在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的强弱,本研究选取子系统各维度中权重值最大的指标作为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为深入分析各驱动因素的作用大小,选取入境旅游收入占出口商品额比重(X_1)、入境旅游人次(X_2)、入境旅游人次占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X_3)、城镇人口比重(X_4)、城市经济密度(X_5)、人均绿地面积(X_6)和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X_7)作为自变量,将协调度(Y)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

表2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of coordinating degree and impact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年份	模型	R ²	F	p
2001	Y=0.301X ₁ +0.234X ₂ +0.312X ₃ +0.163X ₄ +0.138X ₅ +0.028X ₆ +0.090X ₇ (0.667) (0.791) (0.661) (0.759) (0.717) (0.666) (0.817)	0.847	13.457	0.000
2012	Y=0.260X ₁ +0.146X ₂ +0.394X ₃ +0.444X ₄ +0.078X ₅ +0.129X ₆ +0.203X ₇ (0.635) (0.780) (0.826) (0.807) (0.676) (0.676) (0.825)	0.879	17.724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系数.

由表2可知,因变量与自变量观测值的决定系数由0.847增加到0.879,说明2001和2012年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解释度分别为84.7%和87.9%,呈现增长态势,且多元回归的拟合效果较显著.从相关系数上看,所有自变量均超过0.6,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显著性相关关系.其中,2001年只有X₇的相关系数高于0.8,2012年X₃和X₄的相关系数也超过0.8,这说明在2012年,除了社会保障变量外,人口集聚和服务水平也对旅游经济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多元回归模型中标准回归系数值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重要程度,从两个年份的标准回归系数上看,人口集聚(X₄)、服务水平(X₃)、旅游经济贡献(X₁)、市场规模(X₂)和社会保障(X₇)等因素对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驱动作用,而其他因素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

3.2 驱动力分析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上述主要驱动因素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多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政策调控力、经济驱动力、社会促进力、市场推动力和服务竞争力.

(1)政策调控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保障是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体现,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是核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行政体制等的改革和实施是政策调控力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体现.旅游投资的政策支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等是政策调控力对旅游经济发挥作用的直接行为.因此,政策保障和政策调控机制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

(2)经济驱动力.经济驱动力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主导着城镇产业定位和功能转型,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功能的拓展是农业转变成非农业产业的重要方式.因此,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

(3)社会促进力.社会保障能力对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公共福利、就业、医疗与教育等保障社会公平性的措施是城镇化的社会要求.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一种重要途径.培育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对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4)市场推动力.市场推动是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现实动力.城镇化进程推动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性增长、消费结构日趋合理,这为旅游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基础.同时,培育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意识,提高旅游消费能力,扩大旅游经济的本地市场效应,从而提升旅游经济水平,这又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

(5)服务竞争力.旅游业服务竞争力的提升是推动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通过旅游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促进旅游服务水平的提升,增强旅游经济实力,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居民旅游体验质量的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增强,从而推动城镇化的良性发展.因此,通过建立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可有效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

总之,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上述驱动力作用于驱动因素的过程,根据各种类型的驱动力可构建相应的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驱动机制,区域通过培育多元驱动机制可推动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快速发展(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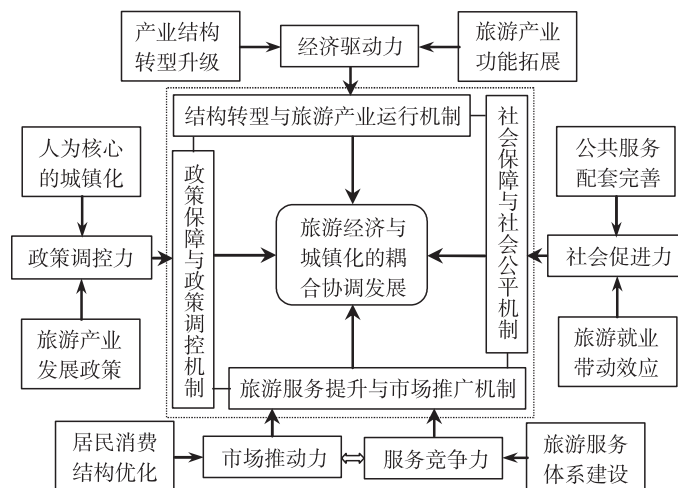


图3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Fig.3 The drive mechanism of system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4 结语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1年和2012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并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4种类型区,最后构建了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有:

第一,2001年和2012年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复合系统总体上还处于磨合阶段。耦合度的空间异明显,上海、杭州和南京等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耦合度较高,复合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而苏北和苏中地区多数城市处于拮抗或低水平耦合阶段。

第二,从协调度来看,两个年份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复合系统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上,处于极度协调耦合的城市只有上海,在上海、杭州和南京的带动下,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的城市逐步形成了以南京、上海与杭州为节点的“Z”字形集聚分布格局,而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的城市主要集聚在苏北和苏中地区。

第三,综合考虑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4种类型区。和谐区和磨合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及其交通连线上的城市,拮抗区集聚在苏北和苏中地区,只有宿迁位于低耦合区。

第四,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由驱动因素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多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驱动力包括政策调控力、市场驱动力、经济驱动力、社会促进力和服务竞争力。通过培育相应的多元驱动机制可推动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测评及其驱动机制构建对于区域旅游业和城镇化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初步选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指标变量测算了2001年和2012年长三角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但构建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长时段多节点来研究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十分必要,值得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1] 陆林,葛敬炳. 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研究,2006,25(4):741-750.
- [2]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326-342.
- [3] GLADSTONE D L.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affairs review,1998,33(1):3-27.
- [4] 黄震方,吴江,侯国林.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160-165.

(下转第116页)

- 院学报,2009,9(1):9-14.
- [21] 许春晓,柴晓敏,叶莉. 杭州世博会居民感知与支持关系变化研究:基于SEM的纵向研究[J]. 旅游学刊,2009,24(10):69-73.
- [22] 陈楠,乔光辉. 游客及本地居民对重大事件活动旅游期望的实证研究: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例[J]. 兰州学刊,2009(3):184-188.
- [23] 陈晓艳,马静卿,李红. 居民对旅游重大事件态度、支持度与期望的实证研究:以2013年常州第八届中国花博会为例[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2):89-94.
- [24] NUNKOO R,GURSOY D.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an identity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9(1):243-268.
- [25] 王起静. 居民对大型活动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J]. 旅游科学,2010,24(3):63-74.
- [26] 汪德根,王金莲,陈田,等.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J]. 地理学报,2011,66(10):1413-1426.
- [27]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44.
- [28] 林震岩. 多变量分析:SPSS的操作与应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7.
- [29] FAULKNER B,TIDESWELL C. A framework for monitoring community impacts of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1997,5(1):3-28.

[责任编辑:丁蓉]

(上接第107页)

- [5] 葛敬炳,陆林,凌善金.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2009,29(1):134-140.
- [6] 麻学锋,孙根年.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J]. 旅游学刊,2012,27(3):36-42.
- [7] 余凤龙,黄震方.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J]. 经济管理,2013,511(7):125-134.
- [8] 杨亚丽,孙根年. 城市化推动我国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分析[J]. 经济地理,2013,33(7):169-175.
- [9] 王兆峰,余含. 基于交通改善的湘西旅游城镇化响应时空分异与机制研究[J]. 经济地理,2013,33(1):187-192.
- [10] 周少雄. 试论旅游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124(2):55-58.
- [11] 吴国清. 区域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区域化研究:兼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旅游互动[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7(1):51-55.
- [12] 赵磊. 城市化对典型省际区域旅游业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1996-2008:以江苏、河南和陕西为例[J]. 人文地理,2011,121(5):99-104.
- [13] 钟家雨,柳思维,熊曦.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2014,34(2):187-192.
- [14] 徐洁,华钢,胡平. 城市化水平与旅游发展之关系初探: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序列动态计量分析[J]. 人文地理,2010,120(2):85-90.
- [15] 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 基于耦合模型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旅游学刊,2013,28(1):62-68.
- [16] 马丽,金凤君,刘毅.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 地理学报,2012,67(10):1299-1307.
- [17] 曹芳东,黄震方,吴江,等. 转型期城市旅游业绩绩效系统耦合关联性测度及其前景预测: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2,32(4):160-166.
- [18] 方叶林,黄震方,段忠贤,等. 中国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J]. 经济地理,2013,33(12):159-201.
- [19] 乔家君. 改进的熵值法在河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中的应用[J]. 资源科学,2004,26(1):113-119.
- [20]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

[责任编辑:丁蓉]